

## 老河口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 目 录

|            |        |
|------------|--------|
| 老河口江湖会起义纪略 | 秦仲道等整理 |
| .....      | ( 1 )  |
| 李秀昂被刺事实真象  | 毛伯屏等   |
| .....      | (132)  |
| 江湖会起义见闻    | 魏学明    |
| .....      | (137)  |

# 老河口江湖会起义纪略

## 一、辛亥革命前鄂北地区的社会状况

### (一) 庚子年前后，帝国主义对鄂北地区的侵略及封建主义对农民的残酷压榨

#### 1、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鄂北地区的侵略

十八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我国的侵略已遍及到鄂北地区的广大乡村和山区。谷城沈家垭子天主堂于一七三一年即成为当时全国天主教的中心之一，为鄂北地区宗教的根据地。下辖五个本堂区，二十一个会口，教徒三千七百余名。有“耶稣圣心殖民地”之称号，建立“圣心堂”，修建钟楼，名为聚集教徒进堂礼拜，实为发布反革命指挥信号的场所。

#### 《沈家垭子天主堂罪恶史料》

一八七〇年，湖北划为鄂东、鄂西和鄂北三个天主教教区，意大利斗西亚省方济格会分得了鄂北十三县（襄阳、枣阳、南漳、宜城、光化、谷城、保康、均县、郧县、郧西、房县、竹山、竹溪）的广大地盘，作为他们侵略活动的范围，定名为湖北西北境教区，后更名为老河口教区。

易堂化遺稿

注：易宣化曾任老河口天主教教区主教，后教区再次划分，成立襄阳教区，又调任襄阳天主教教区主教，并从老河口教区划出四县（襄、枣、南、宜）归襄阳教区节制。

老河口为天主教鄂北教区的中心，整个教区包括襄阳、南阳二府……老堂在沈家垭子，大堂在老河口。设主教一人，各县天主堂有神甫一人，归大堂节制。

李文峰口述

老河口天主堂组织了一个“公教进行会”。全教区各县天主堂也有同样的组织。名为传教，实际上是一个放高利贷的机构和教会司法机关。会内设有正副会长、会计、出纳，均由教友担任。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帮凶们在仁义街教会内私设公堂，又在丁字街原“鸿发”客栈内私设监狱，逮捕、扣押、毒打和审讯债务人。

李文峰口述

天主堂私设的刑堂里面有一座水牢，水齐人的脖子那么深。他们把交不起租的佃农，还不起债的债户和对天主堂的欺压剥削的有血性的男女，投入水牢。他们比衙门还厉害。

张辅臣口述

天主堂在光化、谷城两县占有的土地估计在万亩以上。这些土地都是凭借暴力占绝产、圈洲地和用高利贷兼并侵占的。天主堂土地最多的地方是光化的王甫洲、张集、仙人

渡、谷城沈家堰子、黄山堰子、紫金洞等处。后来天主堂为了侵略政策的需要，逐年高价变卖了大部土地，但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仍拥有土地二千余亩。天主堂除在两县乡间拥有大量土地外，在老河口镇上的仁义街、线子街、陈家井道子等处占有地皮房屋达百分之八十。在其他各县城镇和乡间，亦占有不少的田地、地皮和房屋。

李文峰口述

老河口东门外直到仙人渡上下三十里沿襄河的土地多被天主教所占有。由于襄河经常涨水，以致地界模糊不清，打官司争地界的很多。天主堂凭借他可以左右官府的势力，包揽词讼，因为有人为了打赢官司，或者是打输了官司进行翻案报复，就把土地赠送或者廉价卖给天主堂。从那以后，每逢襄河涨水，田界不清时，天主堂就乘机霸占土地，它把地界扩展到那里，就占到哪里，无由分说。凡是和天主堂土地相邻的业户，受不住欺压，也就干脆把田地廉价卖给了天主堂。

徐采成口述

天主堂高利贷的利息重得很，每四个月一转，利上加利。最厉害的是天主堂专门引诱有一定家产的业主的未成年的继承人借债，暗地规定户主去世时，偿还本利。群众称之为锣钹响利钱（人死了祭亡灵时要敲锣和钹，故名——编者）以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逼成命案的不知凡几。

李文峰口述

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英国基督教内地会牧师金在理伴同吴氏四姊妹来老河口，在光化县西关（现老河口市北郊）建了一个“上帝殿”进行传教活动。叫姊妹会。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又有美国内地会牧师巴××贝××到老河口，在化城门外抬头岗设教堂，开诊所，办学校，叫弟兄会。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从北欧挪威国又传来了“布道会”，尔后在老河口成立了“路德会”，建立了布道区。到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逐渐发展成为节制豫鄂陕三省十八个州县，有三千多名群众的传教活动中心，叫豫鄂陕南部老会。会址在老河口普宁街福音堂，会长鲁大贵。（注、南阳地区以北叫北部老会）路德会隶属之三省十八个州县是：湖北省的光化县、谷城县、均州、鄖阳、鄖西、竹山、竹溪、房县、河南省的邓州、南阳、镇平、淅川、内乡、西峡口、鲁山、南召。陕西省的白河、洵阳。在上述辖区内分别设立了总堂12个（河南省8个，湖北省4个）；分堂仅豫鄂二省有31个，（湖北29个，陕西2个，河南待考）。自一八七五年起先后由帝国主义派来这一地区的男女洋教士有37人。中国传教人员，包括会长、牧师、长老、执事、教习、教官话（华语）的老师共有六十七人。

#### 《老河口宗教志》资料

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挪威传教士费兰德、沙麻来老河口除建（福音）教堂外，并开办中学……招生对象为入教的青少年。圣经是学生的必修科目。教师多是洋教士，他们教学生相信天上有神，有救世主。并常说中国文化学了无用。中国太穷，连你们都没有饭吃，要由我们来养活你

们。他们通过文化这个领域，从思想上奴化中国人民，诬蔑中国人民。

徐士罗口述

从美国来老河口的基督教传教士劳格物，借行医为媒介，利用宗教进行侵略。他放高利贷时专找商号。例如“仁义信”是老河口的第一家大绸缎店，经理唐凤山因还不起劳格物的帐，竟被他用福音堂的名义封了门，并扣押店主，搜查货物，将该店抄掠一空，该店就因此而破产。

李文峰口述

美国传教士安廔，曾去陕勘探石棉和煤，后来又湖北谷城蕨山勘探石棉，并说还有煤和铁。他们勘探过的地方，都拍过照片，绘制详细的地图，嗣后这些东西都寄回美国圣母会，以作为侵略中国的经济资料。

《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襄樊地区进行侵略活动罪行材料》

2、庚子年后，美、英、日等帝国主义掠夺大宗的原料和商品倾销。

由于与外洋通商不断扩大的结果，汉水流域的土特产，如桐油、生漆、药材、木耳、桔子……大批外运出国，老河口市场因而蓬勃发展。光绪年间，已达极盛。各码头停泊船只（旧式民船）达六七千艘。在老河口城东的九里岗可闻老河口市内人声鼎沸，其盛况可想而知。这一时期，老河口城区人口除1878年（光绪四年）因歉收曾一度下降外，已近十八万人了。

李文峰 周君石书面材料

近百万或几十万家底（资本）的字号，在老河口有二、三十家，五万以上的有百多家。

“李兴发”家底有一百多万两。（编者注，两指纹银，下同）。这家商号雇了一百多人，散布在下至汉口，上至兴安一带。此外，“春大”也有资本三、四十万两；买卖桐油杂货的“三合永”有资本五、六十万两。总计当时老河口有三至五十万两资本的商号百多家。

#### 程茂荣口述

漆行生意很大，运销上海、镇江等地。漆行出的“汉票”最硬，最有信用。有个时期水运不通，便由旱路经许昌转运汉口，我们的生漆几乎全销往日本。

#### 徐采成口述

当时老河口大商号有“鼎新”、“怡隆”（黄帮）、“恒升明”，无论牛皮、木耳，凡是山货都办。当时（辛亥前夕）“怡隆”有现金十六万两，“恒升明”以老河口为基地，在上山（指山区各县）到处都安有收购山货的庄口，它下运山货、土特产，上运棉纱、匹头，其资本计算不清，估计总数有一二十万两。

#### 老河口镇工商联座谈会纪录

辛丑年（1901）年八月，日本人便来到了老河口。那时老河口的生漆只要二十四两银子一担（每担百斤），他们每担出价四十八两，而且直接深入到生漆产地保康等处抢购，使民族资本的漆商和制漆业遭受到沉重打击。我们漆商为了抵制

他们，申帮、陕帮和本帮（本地商人）就联合起来，不卖给  
他们货物，专门把生漆卖给申帮。日本人出高价收买，申帮  
也就跟他们抬价相抗争，因而生漆由二十四两一担一直涨到  
一百四十四两一担。但是生漆运到汉口后，价格仍多为外商  
控制，每担只能值价七十两。表面上，日商在老河口开设的  
“再春”漆行因进不到货而停业了，但实际上民族资本却因  
此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程茂荣口述

外地华商来老河口买棉花，日商也来此买棉花，最初花  
价是七百钱一斤。华商为了抵制日商，出七百二十钱一斤。  
日商却凭借雄厚的资本，开始时观望风色，让华商收买一星  
期；然后勾结地方政府，不准华商继续买花，同时自己又出  
八百至九百钱的高价抢购。

郑时功口述

从庚子年到辛亥年这段时期，此地市场上洋货占十分之  
八九。纺织品除了河南绸是国产外，其它如洋布、竹布、海  
平绒等以及日用百货如牙粉、牙刷、香皂全是洋货，其中以  
英美的为最多。

老河口镇工商联座谈会记录

当1904年（光绪三十年）中国掀起了全国性抵制美货的  
反美运动后，美帝国主义者为了缓和中国人民反美的怒潮，蒙蔽  
人们的耳目，就将“英美烟草公司”改称为“颐中烟草公司”  
并且买来大批小鸡，沿街朝每家门里扔。企图用这些小恩小

惠，收买人心。

当时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产的烟，质量很好。大家相约只吸“南洋”烟，不吸美国烟。美国人便大量套购“南洋”烟存下，让其发霉后再拿到市场上去推销。同时，他们又故意将自己的好烟当作霉烟抛掉、烧掉或奉送给吸食者。他们就是这样，利用其雄厚的资本非法地破坏“南洋”烟的信誉，达到其垄断市场的目的。

与此同时，颐中烟草公司还对为它分销的商人实行分红，以资鼓励，凡销烟多的，分红也就愈多。各种手段兼施，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老河口的分公司就这样被挤垮了。

#### 程茂荣口述

辛丑(1901年)以前，襄樊地区只有少量的洋纱和洋布从汉口运来此销售。洋布销售量大约只占当地棉布总销售量的20%，而由农村销售的土布倒占棉布总销售量的80%，鄂北襄河沿岸广大农村土布纺织业还很盛，农家都以织土布为重要副业。例如襄阳西乡的竹条铺、柿子铺和南乡的刘家集、欧家集都以生产土布著名。

辛丑(1901)年以后，洋纱大量倾销，因而所有农家都逐渐改用价格比较便宜的洋纱织布，几乎没有人再自己纺纱了。加之当时运销本地的洋布，价格又比土布便宜(每匹长十丈零几尺，宽二尺八寸的洋布，只卖一两五六钱银子，最好的也只卖三两多；欧家集、刘家集出产的“小布”只有一尺一、二寸宽，三丈多长，每匹卖三百文；竹条铺和柿子铺等地出产的土布好的每匹卖一串二百文)。所以，在辛亥革命

前夕，洋布的销售也逐渐占了上风。

辛亥革命以后，本地市场上洋纱、洋布增多，穿洋布的人也日益增多，因此土布的销路更日趋没落。

孙敦五 殷荣轩口述

辛亥革命前，老河口买办阶级逐渐形成。辛亥首义后，买办阶级便完全形成了。例如“聚兴隆”（烟业）、“李兴发”、“春大”、“徐启祥”等。他们都是依靠充当帝国主义倾销商，掠夺原料的走卒而成为暴发户的。其中规模较大的“李兴发”，一家就经营了“太古”及“亚细亚”两公司的煤油。“国裕”一家竟经营了“大美”、“义和”、“德士古”三家公司的商品，获利之大，令人咋舌不已。

李文峰 周君石书面材料

黄帮帮首张幼亭跟东洋人（日本人）订有交易合同，每年将一万多篓（每篓二百至二百二十斤）的桐油运往汉口向日商交货。

程茂荣口述

“聚昌”跟英美也有密切的关系。它经营英美烟以及美国煤油，它还以英美商为靠山出“汉票”。它家开的六七百银元的“汉票”，半月之后到汉口就得还它一千元。“聚昌”就是这样发了大财的。

老河口镇工商联座谈会记录

余锡珍在民国初年是均县、光化和谷城三县武装商团的

团首（又称均、光、谷三县联防司令），他是靠为日本人办生漆发财的。当地群众作顺口溜讽刺他：“哼！余锡珍，卖土（以前他卖鸦片）营生，发财仗洋人，势力仗军人，到后来，难免炮子穿心”。

徐秉意口述

### 3、封建主义对农民的残酷压榨

襄城杨家是世代大地主，占有土地达四千亩左右。其中大房（子濂溪）有地二千亩；二房（有子君述、君盘等六人）后来分家，每个儿子也分得田地四、五百亩；三房田地较少，也有地一千二、三百亩。他们每年收租只索取少量细粮供全家食用，其余均收银钱，按市价折钱交租，称为“银粮”。

大房开设了“同盛公”钱庄（一说系三房合办），资本达三万串之谱，兼营生漆。光绪年间达到鼎盛时期，宣统年间才日趋衰落。二房经营“乾盛光”钱店，开设于光绪初年，起先资本不大，但由于它凭借杨家的政治、经济势力，出“市票”（每张一串），通行城乡，因此经营蒸蒸日上，鼎盛时期每日汇兑银钱在万两左右。

钱庄之外，杨里垣还经营木厂“崇盛明”和油坊“隆盛大”、“立盛长”，地址都在襄阳城郊东津湾，派专人从汉口运来木材，销售本地，油坊收购芝麻榨油，运销汉口，获利甚多。

杨家为了取得政治势力，就大量捐官。大房杨濂溪捐过道台，是襄樊豪绅巨贾。二房杨里垣的儿子杨老九捐过知县、知州，曾出任过汉川知县，邓州知州。十爷杨君盘虽未

捐官，但名望很大。

郑瑞卿 祝华山口述

刘公的叔伯四房在清末分家时，原有田地一万二、三千亩，每房分到三千多亩。

刘家在清末就没有买过土地，也不经营商业，而是向票号、钱庄、商号大量放帐。利息是一、二厘到三、四厘不等。因此，当时我家握有大量现金，一次就能拿出五千两银子给刘公捐官。我家因为刘公革命用去很多钱，所以到了反袁时，就大量出卖田地，作革命经费。这样一来，到1920年刘公死的时候，全家就只剩下两千多亩土质坏的远地了。

刘同妻口述

注：刘同妻是刘公家中在乡的唯一亲属，所提供情况真实可信，但她所提供的刘家放帐的利率偏小。

刘家（刘公家）一、三、四房都没有开过店铺，只开票号，唯独二房即刘公的二伯父清末在老营开过芝麻油坊，资金有万把两银子，有两个油榨，十个工人和店前店后帮工十人，左右不久，其二伯父死后，油坊也随之停业，直到民国十年才又小规模经营。此外，二房还在老营收购粮食和芝麻等出卖，每次收购额大约四五百担。

李开元口述

注：李开元过去是刘公家的老管事。

谷城当时（辛亥革命前后）共约有三、四十家大地主。如黄家壕的刘“青天”（在陕西作过县官）有土地三千亩，

仪在张集的一个田庄就包括了四十八个土地庙那么大的范围。庙滩的陈惠生有二千多亩水田。四见湾龚绩熙（又名三爷）有二千多亩水田，还有很大的产木耳的山场，他所占的土地数不清。唐家洲的唐陆等占有一千多亩好地。住在谷城县街上的周晓天有一千多亩地，并兼营商业，既是大地主，又是此地的头等商人，他贩木耳到襄阳一带去卖，然后转贩大米、面、盐和杂货等回来，他家常年运货的船有一、二十艘。至于马盛德等七、八百亩地的，只能算是二等地主了。

马歧发口述

苏清泉是均州“八大家”中的首户。苏家到底有多少田地产业，无法搞清楚。大致有田地三、四千亩，当时人们称之为苏百万。苏清泉本人曾经捐过工部侍郎。

苏清泉的生活极端荒淫，他前后大约娶了六、七个老婆，听说有的活活被他家打死。

申柏年口述

这里（光化）的地主将土地出租给佃户耕种时，就强迫佃户预交押租，最少的是一亩地交押租一元，但这是极个别现象。一般的是一亩地交押租好几元，最高的达十元，并规定上租时交“押”，下租时才能退“押”，假如佃户交不齐地租时，就扣押金。押金被扣后，佃户得于规定时间内补交租额或者押金。

地租分为额租和活租两种，额租即固定租，又名死课。不论旱、涝，租额不得短少。额租按季节作物规定，一年内每亩地麦子额租在三斗以上，多至五斗，一年内每亩豆课以五

斗为起点，一般均在五斗以上，最高的竟达一石二斗，谷课一般为五斗至一担。活租即根据实际收获量“公打平分”，地主、佃户各半，这为一般情形。但也有的是四六分，地主得六成。

此外，地主家里有婚丧等红白喜事，佃户应无偿地为地主服役。

李文峰口述

在谷城，当时（清末民初）一般情况是一亩田交一担租谷，有四六分的，（地主得六成，佃户得四成），更有的是二、八分，（地主得八成，佃户得两成），看地缴课。除沉重的地租外，还必须事先缴齐押金。

邹光均口述

光化县地主放高利贷，有一种名为“布袋帐”，农民向地主借粮食一袋，每袋五斗（以袋为准，不经斗秤），一般利息是借五斗还一担或一石五斗，利率为本金的二倍或三倍。也有借五斗还利息三斗或少于三斗的，但这种情形不多。佃农还不起高利贷时，就得以田地产业、农具或耕畜作抵，无财产可抵偿的或将财产抵偿而仍不足时，就得给地主去当雇工。

光化地主放棉花债，通常是借一斤还一斤半，如还不起，农民就会落入当雇工的悲惨的境地。

此外，地主还靠粮食投机买卖，利用粮食新熟和青黄不接时的粮食差价，在新熟时囤积粮食，趁农民青黄不接时高价抛售或高利借贷。不仅如此，地主收租为净粮，大斗，柴

出时是毛粮，小斛。一进出间获得一倍至数倍的暴利。

清末，襄樊地区的税收机关很多，主要的有厘金局（税收总局）、烟酒糖局、税务局等。

李文峰口述

税种也很多，有田赋、百货税、烟税、牙税（即“行厘”税和烟土税），甚至还有鱼税、房屋捐等等。此外，还有各种地方税。一切货物主要稍有移动便要纳税。以宰牛为例，屠户买牛时要纳35%的交易税，然后按头数交纳600的文屠宰税。

徐福堂 殷叔良 刘巨才口述

清末，这里（襄樊）的正税银是亩地一角（合铜元十个），加上收税人营私中饱，实际上要合铜元三十多个。

田赋之外，又附加“亩捐”，作为办学经费。当时全襄阳（府）每年整税银约四万两，每两附加一串二百文的学费。“亩捐”是按地亩计算，按理田地多的人家，出的“亩捐”应该多些，但实际上，那些出入衙门的豪绅地主却往往与收税官吏勾结，徇私舞弊，多在不捐之例。因此又加至了普通老百姓的负担。

郑雨苍口述

襄阳张家湾是鄂西北交通咽喉之一，各种货物运转的集散地。清政府在那里设有厘金局，凡货船经过便要抽税。为防止商人低报货值，即一律按商人所报货物价值加三倍课税，因此来往商贾多受其害。

王寿和口述

#### 4、在帝国主义及封建主义反动统治下鄂北人民的悲惨生活

美国传教士安颢，在襄樊勾结官府和土豪劣绅，包揽诉讼，欺压人民。辛亥革命前，襄阳东乡双沟徐姓大地主与邻村有衅，指使恶棍前往殴打该村农民。嗣后双方诉讼至襄阳县衙，徐姓地主便勾结安颢反诬邻村农民有意寻衅。襄阳县令开堂审案之日，安颢便出庭“作证”。后来，徐姓地主为了感谢安颢，一次就捐钱一千二百串给教堂，并将其三个儿子送入教会学校读书。

《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襄樊地区进行宗教侵略罪行史料》

谷城沈家垭子天主教堂本堂就有八、九丈高的石桩，上刻“严禁匪类”四字，作为教堂处罚教民的刑具。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以后，多少无辜教民被教堂的帝国主义分子绑在石桩上，遭受他们拳打脚踢和鞭打等种种凌辱迫害。

《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襄樊地区进行宗教侵略罪行史料》

清末，天主教传教士索栋梁任樊城本堂主教时，初次去黄龙滩视察教务，经过峪山时，他借口教民家中悬挂的“主对”没有他的英文签字，要加以处罚，除罚教民放炮外，又令教民都得将由他签过字的“主对”贴在家中，每副“主对”收制钱三百文。后来他到黄龙滩，又卖出大批“主对”，大发横财。

《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襄樊地区进行宗教侵略罪行史料》

老河口镇共有八帮（黄、武、江、陕、川、汉、浙等）。各帮有帮首，江帮为李南浦，川帮为段更生，黄帮为程至

全，汉（中）帮为郭子耕，武帮为徐九爷，江（西）帮为李茂轩，汉（阳）帮为李顺安，浙帮为宋子奇。

张彦斌口述

在同帮里，同行业的大字号固然有联系，而不同帮的各个相同行业，也有联系，并组织同行业帮口。

至于小商业、小手工业，除在本帮内有同行业的组织外，不能和外帮的相同行业发生联系。即使有，也完全属于偶然的个别现象，因为帮里是不容许这些小行业超越各帮口组织同行业的统一组织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他们处于阶级剧烈分化中所具有的共同利益，他们终于突破了种种清规戒律和传统的封建地域观念，开始逐渐由个别的、局部的、不稳定的暂时取得某些联系的局面，过渡到各帮间同行的小商小业的大联合。

李文峰口述

“八帮”帮首都有钱有势，每当新任知县到差，首先就要拜访帮首，因为知县得不到帮首的支持，就做不成官的。

老河口镇工商联座谈会记录

黄帮开设的“乾丰”钱铺，老板为辛福安，他很有面子，穷人有事找他得向他磕头求情。持有他名片的人，别人就不敢惹了。

陈公平口述

除“帮”外，还有“典”（即当铺）。“典”具有和